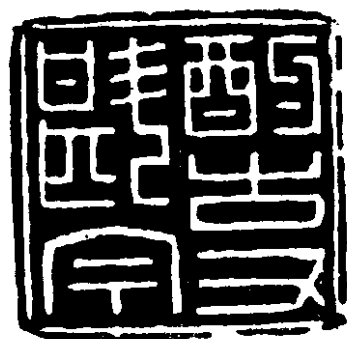


史記論稿



史记论稿



江苏教育出版社

史记论稿

吴汝煜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625 字数237,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 7351·359 定价: 1.75元

责任编辑 徐中文

2007.5.21



作者简介

吴汝煜，江苏吴江人。一九四〇年二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除研究司马迁与《史记》外，还在唐宋文学及古代诗论方面进行探索，发表有一系列论文。

序

王 利 器

今年是司马迁诞辰二千一百二十周年。汝煜同志把他写的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的文章汇成一集，题为《史记论稿》，将付刳劂，以示纪念。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和第一流的文学家。他在文、史两方面的精湛造诣都值得后人进行认真的研究。建国以来，学术界对《史记》的整理和研究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关于《史记》的论文集，就出版过好几种。这些论集一般都侧重于史学方面。同时从文、史两方面来进行研究的，目前还不大多见。这部《论稿》，有十一篇论文是关于哲学与史学的，另外十一篇论文是关于文学的。由于《史记》本身是文、史结合的产物，因此，同时从文、史两方面去研究它就显得特别有必要。《论稿》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首先应该加以肯定。

其次，《论稿》为《史记》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例如《史记与公羊学》一文，作者运用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这样一些看法：汉武帝独尊儒术，实际上是独尊公羊学；司马迁对待公羊学的态度是既有所吸收，又有所突破，既能择其长，又能弃其短；公羊家歌颂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是司马迁歌颂陈涉起义的思想基础；司马迁把匈奴、大宛等国纳入《史记》列传，是依据了公羊家“王者无外”的原则。这篇文章于一九八二年发表后，先被《光明日报》摘登要点，后在《人文杂志》上受到好评，说明已为学术界所重视。又如《魏国徙都大梁时间考辨》一文，作者从

七种文献记载中归纳出四种不同的说法，一一加以辨析。他根据信实的资料，先否定了司马迁的魏惠王三十一年说、裴骃的魏惠王九年说和司马贞的魏惠王二十九年说，然后对《竹书纪年》所说的魏惠王六年说进行研究。魏惠王六年秦孝公尚未即位，商鞅尚未入秦，秦弱魏强，魏国不存在徙都避秦的问题，因此六年说也不正确，但《竹书纪年》是魏国史官所记，而且《水经注》、《汉书·高帝纪》注、《路史》所引都作“六年”，这就值得重视。经过反复研究，发现《竹书纪年》原文应是十八年，在长期传抄过程中，误把“十八”两字合并成一个“六”字，从而使一切疑端，涣然冰释。又如《谈史记散文的艺术美》一文，从探讨司马迁的审美观入手，对《史记》散文的叙事之美、刻划人物形象之美、论赞咏叹之美、艺术风格之美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角度比较新颖。《试论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一文，不仅论述了《史记》对后世散文、戏曲、小说的影响，而且还探讨了《史记》对唐代诗歌的影响。这也是不大为人所注意的问题。

第三，由于汝煜同志是从事古典文学教学的，这些文章大都从教学中来，经过了多次讲授与提炼，选题一般都是大学文科师生比较感兴趣的，内容既有一定的深度，又有一定的广度，行文能注意深入浅出，读起来不使人感到枯燥。象《“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试释》、《李将军列传艺术谈》等，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还是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看，都能给人以有益的启发。

对司马迁这样的伟大作家和《史记》这样的伟大著作，需要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论稿》所涉及的内容虽然有限，但非浅尝辄止者可比。希望汝煜同志在已获得的成就基础上继续努力，不倦地钻研下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企予望之矣。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日于北京

目 录

序.....王利器 (1)

《史记》与公羊学..... (1)

司马迁的儒道思想辨析..... (18)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试释 (31)

✓论《史记》散文的艺术美..... (44)

——兼谈司马迁的审美观

✓略谈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 (72)

✓卓越的史识和高度的艺术概括的结合..... (77)

——谈司马迁对陈胜、项羽、刘邦形象的塑造

司马迁对历史素材的艺术处理..... (93)

读《高祖本纪》..... (98)

谈《屈原列传》..... (105)

✓论《淮阴侯列传》的思想和艺术 (113)

《李将军列传》艺术谈 (132)

论《史记》中的风谣歌诗 (149)

✓试论《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156)

关于《史记》的著述目的、断限及其他..... (175)

论司马迁的生年及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189)

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探讨 (207)

——兼谈此事对写作《史记》的影响

司马迁与孔子治史态度的比较	(217)
司马贞《史记索隐》与《竹书纪年》	(223)
魏国徙都大梁时间考辨	(231)
✓论项羽	(240)
关于游侠的评价问题	(255)
《史记》读札	(260)

附录

司马迁的世系及简谱	(271)
司马迁交游略述	(279)
《史记》名称及材料来源	(285)
关于“父子相继纂其职”	(287)
《史记》的补作者和续作者	(289)
《史记》的流传及注本	(292)
《史记》版本略述	(295)

后记	(300)
----------	---------

《史记》与公羊学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①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他的理论思维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因而必然与后世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②武帝之世，思想界的情况比较复杂。努力了解这种复杂的情况，对正确理解司马迁的巨著《史记》是有帮助的。本文仅就《史记》与公羊学的关系，略陈管见，以见正于方家。

一、武帝时代公羊学的显赫地位

汉初高后文景之世，盛行黄老之学，而儒家势力正在悄悄地抬头。文帝时，《诗》被立于学官，设博士。景帝时，《春秋》被立于学官，治《公羊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都是著名的经学博士。景帝已经开始进用儒生。他任命治鲁《诗》的王臧为太子少傅，^③任命传韩《诗》的韩婴为常山王太傅，任命传齐《诗》的轅固生为清河王太傅，任命通《春秋》的文翁为蜀郡守。另外，曾从田何受《周易》的丁宽得为梁孝王将军，率兵拒吴楚叛军。由于当时提倡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还健在，景帝不便公开与太后唱反调，因此他只能在儒家受压的情况下稍稍给予一点支持。一次，窦太后召轅固生问《老子》书，轅固生说：“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大怒，罚他去与野猪决斗。景帝生怕轅固生有失，私下给了他一把快刀。结果他一刀正中野猪心脏，得幸免于难。在这场儒道之争中，景帝实际上袒护了儒家。景帝时

期，三家《诗》都比较见重，《公羊春秋》虽然刚兴起，但也开始产生影响。如传齐《诗》的轅固生在景帝面前与黄生辩论汤武革命，为汉朝代替秦朝提供历史根据，用的就是《公羊春秋》的思想武器。胡毋生后来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

武帝即位以后，儒学的地位大大提高。武帝为太子时，在王臧等儒生的辅佐下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王臧治鲁《诗》。鲁《诗》重在宣扬人伦道德，^④这虽然也有补于教化，但武帝时代更重要的是要借鉴历史经验和吸取儒家治道，以加强中央集权，而公羊学所宣扬的一套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因此，博通五经、尤善《公羊春秋》的董仲舒就很快受到重视，成为一代儒宗。

董仲舒曾向武帝上过著名的天人三策。其第三策的最后几句说：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⑤

武帝采用了这个建议。这就是后世常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据《汉书·武帝纪》记载，董仲舒的对策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则移此事于建元元年。按之史实，《汉书》为正。建元元年，武帝年仅十六岁，政权操在祖母窦太后之手。此年十月，“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侯外庐先生等据史念海说，以为卫绾此论为迎合武帝崇儒而陈奏，^⑥意在尊儒。其实，卫绾以工戏车为郎，历仕文、景、武三朝，立身行事，多得黄老之学精义，深受文帝信任，为窦太后所倚重的老臣。他主张罢免所举贤良，正是为了维护黄老之学的统治地位。他觉察到武帝有崇儒之意，于奏章中故意不提儒学，正是黄老派处世的狡黠处。张维华先生以为卫绾的奏议“暗含着”要求罢免黄老之学的意思，^⑦这与他把卫绾误当作儒生有关。^⑧《盐铁论·除狭篇》载贤良语曰，“戏

车鼎跃，咸出补吏，累功积日，或至卿相。”汉代儒生对卫绾持讥讽态度，更证明他们不是一路。卫绾的奏议说明，主“国政”的黄老派已感到儒学势力的威胁，所以要极力加以排斥。这可以说是武帝即位后的第一次儒道之争。斗争的结果是儒家暂时失败了。建元二年，王臧、赵绾正式提出尊儒的主张，议立明堂，公开为尊儒张目。王臧还特地把当时最有威望的儒学大师申公从鲁国请来，武帝亲自接见，问以治乱之事。窦太后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她伺察到王、赵两人的过失，责让武帝。武帝被迫废明堂事。王、赵两人自杀。申公也因为未提出切合当世的政见而罢归。这是武帝即位后的第二次儒道斗争。斗争的结果，儒家又暂时失败了。武帝认识到，鲁《诗》在政治斗争中缺乏力量和办法，应该别有所求。元光元年，窦太后去世，武帝诏贤良受策察问，“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⑨由此可见，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确是元光元年所上，武帝采用他的建议，也是元光元年之事。武帝认为，公羊派的学说更能适应自己的政治需要。独尊儒术，不是尊奉所有的儒家经学流派，而是以尊奉公羊家《春秋》为主。

《春秋》一般认为是孔子所撰。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⑩董仲舒也说：“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义焉。”^⑪司马迁上承孟子、董仲舒的看法，认为《春秋》确为孔子所作。他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寓王法”。^⑫他还指出，《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⑬由于《春秋》含有微言大义，加上孔子当年只凭口说传授给七十子之徒，没有写成著作，故“仲尼没而微言绝”。“《春秋》分为五”，即《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左氏传》最先成，但长期“隐

其书而不宣”。“《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谷梁传》为瑕丘江公所传，江公与董仲舒同时，但不善于言辞，武帝曾让他“与董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⑭

《公羊春秋》共十一卷，齐人公羊高所传。其传授系统，据唐徐彦《公羊注疏》引戴宏序称：“子夏传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今本《公羊传》中有“子司马子曰”、“子沈子曰”、“子北宫子曰”、“子公羊子曰”等语，可见传者不止一人。景帝时，公羊学开始与利禄相结合。至武帝时，公羊大师胡毋生的学生公孙弘以“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董仲舒为江都王相、中大夫、胶西王相，号为“群儒首”。他的学生有不少人在朝廷供职，重要的如吕步舒，官至丞相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⑮褚大，官至梁相。后来，武帝诏贤良对策，也明确指定要“俱以《春秋》对”。^⑯实际上是以公羊学取士。酷吏张汤迎合武帝意图，“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⑰从此，公羊学开始以显赫的地位在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活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成为武帝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司马迁对公羊学的态度

司马迁生活在公羊学最盛行的武帝时期。他曾师事董仲舒，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关于这个问题，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多方面的情况来考察，是确凿的。

首先，从时间、地点上说，司马迁完全有机会从董仲舒受学。“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⑱据侯外庐先生说，“他约生于高祖（按：当是“高后”之误）中年，卒于武帝元狩之间”。^⑲晚年

移家茂陵，^②正好与司马谈同居一地。其时司马迁十六、七岁，正是受学的理想年龄。

其次，司马迁于当时的公羊学者中，最推崇董仲舒。武帝时代，胡毋生、公孙弘、董仲舒都著有发挥公羊家学说的专书。胡毋生的著作至东汉犹存。何休《公羊解诂序》称：“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胡毋生的著作，何休能见到，司马迁当然更能见到，但他在《史记》中却没有称引此书。公孙弘著有《公孙弘》十篇（见《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清人马国翰有辑本^③），但司马迁同样没有称引此书，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他认为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董仲舒著有《春秋灾异之记》及《公羊董仲舒治狱》。前者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特别提出：“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后者虽未提及，但他的弟子吕步舒依《春秋》之义治淮南狱，大概就是以董著为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说明董仲舒著作不少。可惜流传到今天的只有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以下简称《繁露》）十七卷。今本《繁露》内容较杂，且有脱误错简，未必全部出于董氏手笔，但其中阐发《春秋》之义，多与《公羊传》合，颇著精语，当属可信。司马迁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又说：“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④建元、元狩之间，正是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和著书立说，使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使《公羊春秋》大为盛行的时期。“文辞粲如”一句，就是对他的高度评价。司马迁如此推崇董仲舒，贬抑其他各家，这种鲜明的倾向性，很自然地告诉人们，他与董仲舒有着师承关系。

第三，董仲舒对于孔子作《春秋》的动机的解释，直接启发了司马迁，成为他著《史记》的指导思想之一。《太史公自序》云：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集解》引服虔曰：“仲舒也。”）曰：‘周道衰废，孔

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称董仲舒为董生，与称庄子为庄生，黄子为黄生，胡毋子为胡毋生一样，有表敬之意。上引董仲舒的话，不载于《天人三策》。《繁露·玉杯》篇说：“《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意思与之相近。孔子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②公羊家认为孔子有志于推行王道，周游列国而不遇，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春秋》之中。《春秋》是孔子为后王制定的最完备的王法，因此足以作为“天下仪表”。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里也说过孔子“次《春秋》”，“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等语，说明他对《春秋》的写作意图的理解，本之董仲舒。他要把《史记》写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言”，就是有意追攀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家心目中的《春秋》。

下面试将司马迁在《自序》中回答壶遂“孔子何为而作《春秋》”的话，与董仲舒的有关言论作一比较，将不难看出，司马迁与董仲舒在学术上的师承关系。

《自序》：“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繁露·俞序》：“《史记》（按：指《春秋》）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

《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繁露·盟会要》：“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采摭托意，以矫失礼，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弃，以纯其美，别贤不肖以明其尊。”

《自序》：“《书》以道事。”“《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繁露·玉杯》：“《书》著功，故长于事。”“《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自序》：“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②4}

《繁露·王道》：“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春秋》纪纤芥之失，反之王道。”

《自序》：“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繁露·重政》：“《春秋》变一谓之元……元者为万物之本。”

《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繁露·灭国上》：“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自序》：“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繁露·俞序》：“至于杀（凌注：当作“弑”）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

《自序》：“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繁露·楚庄王》：“《春秋》，义之大者也。”

由此可见，司马迁的《自序》所引董生语，大都可以从《繁露》中找到踪迹或大致相同的意思。这不可能是偶然巧合，而是他曾从董仲舒受学的印记。

不过，司马迁毕竟还受到过学术修养很高的父亲司马谈的教育。司马谈对儒家的缺点看得很清楚。他的《论六家要指》写于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以后，其中“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一句，很可能是针对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而发的。司马迁受到父谈的影响，极富于批判精神。他推崇孔子，却没有把孔子的每一句话都当作金科玉律；同样地，他从董仲舒受公羊学，也没有把公羊家的学说

全盘接受。司马谈对《春秋》的看法是：“《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个看法，与公羊家有些不同。他理解的《春秋》重点是褒，所以他要司马迁写《史记》，着重论载汉朝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司马迁把父谈之语写入《自序》，作为对壶遂的责难的回答，表明他是接受这一观点的。另外，他对公羊学还有所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怀疑和讽刺灾异说

儒家的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等，都有关于灾异的记载。司马迁说：“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②这是说，孔子没有把灾异与天道、天命之类的问题写成书，传授给弟子。司马迁显然赞同这种做法。《公羊传》记灾记异，名目较多，但尚未发展到附会穿凿的地步。这与孔子的“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③有关。司马迁指出这一点，表明他对董仲舒以灾异解释人事的做法抱怀疑态度。董仲舒讲灾异，讲天人感应，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如说：“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④又如他的天人三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这些话，虽然也可以理解为董仲舒想借助神权限制君权，^⑤但其内容毕竟是虚妄的。司马迁在《自序》中指出：“星气之书，多杂机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如果说，这是间接地批评了董仲舒的话，那末，《儒林列传》对他的批评就比较直接了：董仲舒著《灾异之记》，被主父偃偷来奏上武帝。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书，认为书的内容“下愚”，判处作书者死刑，然后汉武帝又戏剧性地给予赦免。董仲舒经受这一次惊吓，从此“不敢复言灾异”。“下愚”两字，司马迁特意让其弟子吕步舒说出，讽刺性是很强的。《史记》中略去了战国秦汉之际很多有关天人感应的灾异之事而不载（如《刺客列传》不取“天雨粟、马生角”之说），表现出与董仲舒不同的卓识。毋庸讳言，《史记》中也确实记有“赤帝子”、“白帝子”一类

的怪异之事。这是历史上的大疑案，史家不能不记。司马迁于叙述之中，常故意露出疑窦，让后人自己去辨析，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史记》揭露了历史上很多怪异之事的内幕，如辛垣平诈称天赐“人主延寿”玉杯（《文帝本纪》），李少翁诈称牛腹有异书（《封禅书》）之类。推而广之，可知《史记》中所记怪异之事，不过是尽史家实录的责职，而不是有意宣扬迷信。

（二）不取公羊家的讳饰态度

修史重讳，始自孔子。孔子修《春秋》，“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②何休注：“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公羊传》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③实本之孔子。至董仲舒则加以发挥说：“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讳，畏与义兼，则世愈近而言愈谨。”^④这种态度，不可能正确反映历史实际。“以智讳”是向强权屈服，“以义讳”是美化死人。这样做必然要歪曲历史。司马迁不取这种态度。他批评孔子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⑤他不忌讳当世，对本朝帝王及将相大臣或褒或贬，都能秉笔直书，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公羊家所不能望见其项背的。

（三）不贵虚名

《公羊传》最贵虚名。鲁隐公有让位之意，而无让位之实，《公羊传》极尽美化之能事，在字里行间千方百计成全他让位之意。^⑥宋襄公在泓之战中有行仁义之名，而无战胜之实，《公羊传》同样极尽美化之能事，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⑦至董仲舒则愈益放言高论，提出“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⑧的命题。司马迁是重事实、讲功利的。他对鲁隐公没有特别褒奖，在《鲁世家》中只有淡淡几笔。对宋襄公在战争中讲仁义，持否定态度。《宋世